

# 从“责任伦理”到“职业美德”:现代职业道德困境与德性论路径

赵波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上海 201415)

[摘要]现代社会中,职业道德所表现出的高度的行业性、价值中立、形式理性、技术理性等特征亦为其自身带来了众多窘况。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当前职业生活中的道德困境:职业道德的非道德化倾向。想要正确解决职业道德的困境,就要以德性论伦理学为基础,准确把握职业道德的根本属性,让职业领域中的道德准则对于主体的道德品质也能够发挥作用。此外,厘清社会职业群体的美德标准,宏观把握新时代劳动精神的核心意蕴,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在充分发挥其调节职业领域劳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让崇尚劳动、见贤思齐成为时代新风尚。

[关键词]职业道德困境;德性论;职业美德;劳动精神

[中图分类号] B822.9+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5-0109-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5.037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 一、职业生活规范的道德困境及其由来

从道德的本质来说,道德应该体现在道德主体行为的善与恶、是与非、应当与否的价值评价以及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是作为道德评判者的个人道德立场的写照。但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伴随着近代社会以来职业领域中道德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逐渐用价值判断代替了事实判断,从而因为缺乏道德或社会原则而表现出一种‘非道德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体现为:

首先,缺乏善恶评价标准。与传统道德规范相比,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是行业职业的规范,它仅对主体承担的职业角色(行为活动)做出评价,罕见对于道德主体个人进行评价,回避个人的善恶好坏,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道德的评价功能,在职业道德领域中几乎很难寻觅。除非社会成员在违反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违反了社会公德或家庭伦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看到以职业道德的标准来评价社会成员是好还是坏、善或恶,最常见到的是对从业者对或错的评价。当然,这里的对或错的评价,主要是源于技术意义,从业者的行为符合技术标准和规范,则被视为“对”,反之得到的评价就是“错”,这样的评价一般不会涉及对从业者个人价值选择的对错评价。

其次,缺乏精神内涵。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伦理道德往往与精神生活、价值与秩序等密切相连,究其原因,道德标准从本质上来说也反映了价值标准,道德意识水平亦是人的精神信仰的反映。社会成员所表现出的道德行为、现象,本质上说也是与其人生观和精神信仰密切联系的;它反映了个体的精神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甚至对部分人而言,道德信仰就意味着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

在十六世纪欧洲教会革新运动时期,西方的职业道德萌芽开始出现,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精神维度,例如彼时的宗教

“天职观”思想。此处的天职并不是所谓的世俗的工作,它和人的衣食住行等作为生物体的本能活动不同。欧洲宗教改革中的“天职”被赋予了神性,体现了当时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和追求。社会成员们凭借对于“天职”的履行,从而实现人的自我救赎。近现代社会中的职业或工作对普通人而言只能算作谋生的手段,其本身早已摒弃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人们从事职业和劳动只是为了获取报酬,工作和劳动并不能体现出价值的目的。职业道德规范不再被赋予精神的内涵,它只是被当作作为技术或者操作规范,只能被当作作为提升工作效果的“工具”。但是,由于职业道德精神的缺失,导致其只能被视作“工具”性符号,最终的结果是其沦为“器物”。

职业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大都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缺乏普遍的道德标准。一般来说,职业道德标准的形成主要源于行业本身,并且主要由行业协会或者“法团”来制定职业道德规范。不同的行业、职业具有显著不同的职业道德,而且一般来说,它们之间并存不悖。正因如此,已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职业道德就成了“自由王国”,大家各行其道,某一行业的职业道德无法对应解决其他行业的问题。即使出现两个内容相似或相近的职业道德,并不意味着它们体现了同样的道德规范,究其原因它们是它们所在的行业特色之间较为接近,事实上,它们之间缺乏相互认可的一般道德标准。这样的境地,使得各职业的从业者之间对于化解社会问题难以实现共通。因此,在现实语境中,各行业的职业道德对于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失德现象无法做出有力的驳斥,更无法抑制社会道德问题的外溢。

事实上,职业道德作为社会道德在特定领域中的反映,并不意味着与社会“普世价值”无任何关联,其自身蕴含着对于道德标准的共识。从职业道德公认的标准来进行剖析,显

收稿日期:2025-1-3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德性论范式下新时代职业美德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ZKS005)。

作者简介:赵波(1979—),男,江苏泗阳人,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职业伦理建设。

而易见的是对于职业道德,人们不能只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因为职业道德客观上还会影响到所处的社会整体秩序。倘若人们只是片面地认为职业道德仅仅与个人道德行为有关,而与社会现实相脱离,这事实上就是对于职业道德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的曲解。从西方社会近代化以来,职业道德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并且能在社会领域中充分发挥其优势,究其原因就是近代以来的职业道德理论能够有效化解社会道德或者说是职业领域中道德失范的现象。

当代社会职业领域中道德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非道德化倾向,缺乏普遍标准。职业道德领域中为何会有这样的现状呢?在此我们有必要借助德国古典哲学做出深入的分析。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认为,职业道德并非出自普遍法则(Universal Law),而是完全地将经验事务作为依据,并过度依赖质料性事务,其中的质料(Material)就是职业要求。在哲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是完全不依赖于经验而是先天独立存在的。当康德面对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时,他认为人们倘若非要将质料因视为道德标准的决定因素,这将必然引发职业道德自身的分裂。

众所周知,个体的身份和职业是职业道德的着眼点,而且现实的境遇是个体还会承担多重角色,具有多重不同的身份。客观上来说,如此的多重各异的角色和身份都从外在的“质料因”(matter)中提出来的。而这些“质料因”并没有完全正确地反映出人的整体性,如果衡量道德的标准为“质料因”,那么每一个行为个体都会从自身出发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不同的职业也将会制定各自的道德准则,但是这些行业准则却无法成为普遍必然的法则。依据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不能为职业道德领域中的道德冲突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式,从而成为目前职业道德领域标准失衡的本质原因。况且,进一步来说,如果将职业道德仅被作为质料性来使用,这样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工具主义的泛滥。究其原因,个体将无视价值和精神问题,只强调外在的最终的结果;更有甚者,通过西方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m)的升华,人的精神和神圣精神都被当作实际的功用,因而也不能够提供价值担保。确定地说,作为道德总原则的善和恶,只能在道德原则和规范中存在,并不是自在之物,如果将外物(自在之物)作为依据,职业道德理所当然就会出现非道德化的倾向。

## 二、化解职业道德问题

### (一)如何看待德性伦理

如果从“质料因”(matter)的角度来探讨,由于身处于不同的职业、行业角色,必然将会形成内容各异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事实上,如此相异的道德规范是很难正确反映出道德主体的道德品质。于是,想要正确解决职业道德的困境,人们就要以德性论伦理学(Virtue Ethics)为基础,准确把握职业道德的根本属性,让作为职业领域中的道德准则对于主体的道德品质也能够发挥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流派,他认为人的德性并不是零散破碎的。探究“德性”一词出现时的原本内涵,指的是事物本身所蕴含的优秀性质。出生于1929年的英国德性理论哲学家麦金泰尔认为,在荷马史诗中,人们对于“areté”一词的理解,大都被用来当作那些任何种类的优秀(excellence),只是后来才逐渐被译

作“美德(virtue)”。“virtue”一词的含义中也逐步兼具道德品格的意蕴,并且逐步脱离了古希腊文化中“areté”一词的本义。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不仅是一个人的角色,更是人的“完善的内在品格”。在古希腊思想中,最常见的德性即所谓的“四主德”即“智慧、节制、正义、勇气”,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会说,“正义的人”或是“节制的人”。智慧、节制、正义、勇气都是对人的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水平的总和反映。在德性论伦理学家观点中,说谎是错误的道德行为,这并非在于“说谎”侵犯了其他人应当了解事情是非曲直的权利,而是在于作为道德主体,“说谎”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行为自身就是最大的“恶”,是一种低劣的品格。类似于这样能够作出整体性的评价或者能够对于人的精神和行为品德的评价正是职业伦理所缺失的。在职业伦理视域中,道德评价的对象是一位是否称职、合格的从业者,以及从业者的职业行为的善和恶,而对个体自身却不会作出道德评价。

人的优越品质是德性的基本内涵,从这点来说,与职业道德观点中的特点——才能、规范不谋而合。由此,从本质上说,职业道德可被视作道德主体所具有的某种“德性”,这样的“德性”是对于道德主体的品行和才能的反映,职业领域中反映出的优秀品质与主体的根本品质并无“异化”。在现行的职业领域中的道德评价体系里,人们通常将职业(岗位)中的技术规范,当作首要的评价标准。虽然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道德评价体系中的纯粹的技术化、理性化特点,彻底摧毁了人的品格的完整性。在德性论伦理范式下,将职业道德视为社会主体的卓越品质和首要德性,并且对主体的行为做出整体性的道德评价。由此,这成为有效解决职业道德领域中现代性问题的必然之选。

### (二)由普遍道德推及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否能被推导、归纳出来,能不能尝试从某个普遍的道德规范推导演绎出不同行业中的具体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是却充满争议性的话题。重新审视真实的社会现状,各式的职业道德业已不能作为演绎的结果,它们着眼的是现实工作。现代职业道德的最大特点是明显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无法统一的、各式各样的职业道德规范。由于职业道德所具有的行业背景各自相异,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各出心裁,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道德困境,化解的途径也各不相同,以至于出现不同行业、职业领域中的职业道德相互间的道德冲突现象。面对职业道德冲突的现象,人们基于职业道德准则和职业行为所蕴含的价值,做出“应该”与“不应该”的道德选择。当然,如果对价值选择排序,客观上就需要先行拥有或制定出一个普遍规范。

康德的道义论思想是典型的规则道义论,他认为应该先行制定一个普遍的规定(道德原则),根据已经确定的道德原则,身居各行各业中的可以发展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道德规范,因此,作为一个普遍规定的道德原则,引导和形成了不同的实践规则。与康德理性伦理学相似,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囊括了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的研究,以及对这些原则的应用性研究两个部分。当然,它们同样也都侧重强调了“原则”的先验奠基作用,而非“应用”。职业道德反映职业、行业以至产业特殊利益的要求,是一般道德规范在职业(行业)领域中的具体化、特殊化,是对一般道德在职业行为

中的反映。“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宇宙间存在一个统一的最高原则或“理”,“理”便是一般的道德规范,强调了在普遍原则(理一)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分殊)。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行业(职业)道德,然而这些具体的道德都是一般性道德规范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反映。当然,单纯的演绎法是无法真正开展伦理学研究,因为单纯的演绎法不仅无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恰恰会为研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本质上来说,这样的疑惑只是留于表面,并未认识到假如普遍规范是不存在的,就无法理解具体规范是怎样成为规范的,任何具体的道德规范都将无法自发形成。

康德曾在其论著《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认为,人的意志所依据的准则永远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并且认为纯粹理性单凭其自身来说就意味着实践,且为主体提供了一条被称之为道德法则的普遍法则。道德传统在职业领域中表现出的最大问题在于其过分倚重质料,进而引发职业领域中的非道德化现象,以及职业道德规范的缺失的问题。

实际上,重新审视以上所提及的两条解决路径,其分别对应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也就是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道义论(Deontological Theories)理论。虽然二者的理论体系个性彰显,独具匠心,但是二者均注意到了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存在着“零散”的现状,都在探寻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则来解决业已存在的“零散”的状态。当然,存在于现代社会当中职业道德也许可能还算不上现实社会中最严重的道德危机,而是更多地在于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道德相对主义是主张社会、文化、历史或个人境遇的相对主义,它使得各种价值观都得以合理化;道德虚无主义主张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拥有道德/不道德这种性质的行为或者事件,它更是消解了一切永恒的、神圣性的价值;工具理性主义成为现时代的主流,它将事物视为手段或工具来对待,强调效率和功利的最大化,对事物所拥有的精神价值置若罔闻。一般性道德规范作为现代职业道德的根本,此时其本身反而暴露出混乱的情况,这样的现状必定将影响至职业道德。这就是近现代社会的职业道德建设所面临的“根源”性问题,虽然解决现实困境和挑战需要直面职业道德建设中的难点和堵点,但现实的“根源”性问题却无法回避。所以,想达到有效解决困境中职业道德矛盾的目的,首要条件是确立基本的、一般性的价值规范。在强调开展德性的整体评价的同时,还强调需要从一般性的道德原则基础上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出具体的规范,从而形成各行业(职业)内的职业规范并作为一般社会道德的特殊表现形式。

### 三、以劳动精神引领社会风尚

#### (一)厘清社会职业群体的美德标准

在德性论视野中,“幸福”是完全不同于功利论理论体系中的“快乐”,而且是和共同体(国家)的“福祉”紧密相连的。美国著名的女性哲学家努斯鲍姆在其成名作《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的书名中使用的 goodness,指的就是人的“良好生活状态”。

“福祉”代表了特定共同体的繁荣景象。但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从贵族民主制出发,歧视从事具体职业的活动。与之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和理论中则注重劳动的作用,

认为劳动创造财富是“永恒的真理”。在劳动过程中、人类共同体力量的运用中,完整展现“善”的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udaimonia”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把美德放在共同体的构建中进行考察,认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就是对于全体劳动人民的美德予以充分的肯定。

对于劳动的作用,卡尔·马克思在政治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劳动能否成为财富的源泉,重要的是劳动能否拥有社会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劳动既是为财富的源泉,亦为幸福的源泉。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式难点和堵点问题,以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务必凭借全体劳动者共同的诚信劳动和诚实劳动。

#### (二)劳动光荣彰显时代新风貌

新时代劳动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意蕴丰富,历久弥新,是时代精神和当代劳动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劳动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中国精神。在弘扬劳动美德的同时,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华传统职业美德新气象、激发新活力。在新时代语境中建构职业美德,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高度,“将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三牛’精神等结合起来,用‘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时代宣言凝聚社会正能量”,厚植新时代新风新貌。

从伦理的普遍性出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全面的人。为此,新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坚定确立劳动是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以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的思想,始终将劳动的解放视为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内在尺度与核心内容。从劳动的社会意义考量,劳动的解放本质上就是要消灭奴役人劳动的私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人人平等地享受劳动成果。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劳动观念例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北宋汪洙·《神童诗》)为标志的观念应该予以摒弃,与其相对应的应是凝聚奋进力量,“大力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功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构建和谐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伦理和职业道德,营造劳动者光荣可敬的社会氛围,让劳动者更有尊严。

#### (三)倡导劳动最美社会风尚

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的是资本的无限增殖,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资本驱动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具有内在对抗性,进而使得社会文化日益低俗庸俗媚俗。在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浸染下,劳动之美、劳动之乐逐日暗淡,劳动观念日渐淡薄,躺平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劳动生产了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抒胸臆并论述了这个观点,充分揭示了“劳动创造美”的本质。对于劳动本质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将其视为蕴含伦理原则和价值意义的实践过程。基于此,劳动在将人际关系置于合理的伦理价值关怀的同时,更是有效地把人们引向新的

幸福的世界,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成就梦想。

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社会成员坚定确立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神圣、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最值得尊敬的思想,能够有效营造出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让社会成员充分肯定和赞美劳动,充分感悟劳动过程以及劳动所蕴含的美。

参考文献:

[1]李育书. 职业道德:兴起、困境及其化解之道[J]. 伦理学研究,2018(3).

[2]于希勇,洪建亚.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美德伦理特质[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3]郭笑雨. 新时代弘扬劳动精神的劳动伦理审视[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4]郑莉,郝赫.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 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动工会改革创新[N]. 工人日报,2022-5-29(1).

[5]许晖. 高校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育人路径探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20).

From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fessional Virtue”: The Modern Dilemma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the Path of Virtue Theory

ZHAO Bo

(Shanghai Urban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Shanghai 201415,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he highly industry-specific, value neutral, formal r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hibited by professional ethics have also brought numerous difficulties to themselves. Among them,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e moral dilemma in current professional life: the tendency towards non mor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To correctly solve the dilemma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t is necessary to use virtue ethics as the founda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enable the moral standards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to also play a role in the moral qualities of the subject. In addition, clarifying the moral standards of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groups, macroscopically grasping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new era's labor spirit,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craftsmen, and labor spirit, and on the basis of fully exerting their regulation of labor ethics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making the worship of labo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wisdom and ideas a new trend of the times.

Key words: professional ethics dilemma; virtue theory; professional virtues; labor spirit (责任编辑:范新菊)

(上接第108页)

参考文献:

[1]张西平,管永前. 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总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胡芷璇. 茶文化视角下高校对大学生礼仪素养的培育研究[J]. 福建茶叶,2021,43(11).

[3]王璐. 新媒体在中国茶文化中的传播和对外翻译中发挥的作用[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1).

[4]孟庆平. 文化自信视角下茶文化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J]. 福建茶叶,2021,43(11).

[5]孙秀莉. 探析中国茶文化在英语语言文学翻译中的体现[J]. 福建茶叶,2021,43(11).

[6]殷召荣. “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茶名英译的跨文化研究[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5).

Research on the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Tea Culture by International Tour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GAO Meng-wen, PAN Jing

(Wu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ea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 is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day by da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tea culture by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nalyzes its roles in promot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 their perception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tea cultur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learning of Chinese tea culture and further enhance its influence in oversea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tea culture; international tourists; cognition; acceptance (责任编辑:陈思婷)